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 译 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MARX'S REVENGE

马克思的复仇

——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著

汪澄清◎译 郑一明◎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ARX'S REVENGE

马克思的复仇

——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译 郑一明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英] 德赛著；汪澄清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ISBN 978-7-300-09217-1

I. 马…

II. ①德…②汪…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20世纪②社会主义-研究-20世纪

IV. D033.3 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0377 号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 译

郑一明 校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65mm×230mm 16开本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 张 22.5 插页 2

印 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398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

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见解；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① [美]安·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1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教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他于1940年7月10日出生于印度的巴罗达（Baroda），后来在孟买大学学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完成博士论文，1991年4月30日成为勋爵。德赛勋爵自1965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83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92年创建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史、南亚研究和全球化等方面。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相关作品包括《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伦理学与经济学》（1995）、《世界政治经济：选集》第一卷（1999）、《全球化：既非理想主义亦非乌托邦》（2001）、《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全球治理》（2001）、《货币与全球市民社会：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2001）、《马克思的复仇》（2002）、《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2003）等。

众所周知，德赛勋爵也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诚如作者所言，“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1968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我在1970—1971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1989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

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①这段话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复仇》写作动机的重要交代。继1974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79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之后，德赛于1989年12月完成了《列宁的经济学著作》一书，而这部著作赶在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②之际出版，其深刻用意在于本书第1章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就是由此发现了马克思被误解的秘密。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复仇》是作者把全球化研究与马克思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展示了这样一幅生动图景：19世纪末全球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过“行将就木”的百年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运动而再度兴起，并显示出强劲生命力。伴随这百年历程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这场斗争背后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还有自由主义的衰落与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马克思的复仇，也就是说，当今全球化复活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是，在它自身能量耗尽之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他^③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去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④。

可以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说明了以自由市场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实为大势所趋。自由市场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不仅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灭亡，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复仇。

事实上，作者在第1章已经对本书的整体框架作了很好的安排：“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

① 见本书“序言与致谢”。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允许居民自由过境，两天中有75万民主德国人涌进联邦德国。这股洪流把象征德国分裂的柏林墙“推倒”。

③ 指马克思。

④ 见本书第9页。

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博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19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①

总的来看，作者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变迁，二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沉浮，三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衰，四是21世纪全球主义的到来。

一、描述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变迁

20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隐患甚至穿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导致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为激烈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面临着德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政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等，并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存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竞争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的名下进行的，甚至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整个20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对付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曾对德国共产党进行过疯狂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到处搜捕共产党分子，并把此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后来还推出国门，先去朝鲜，然后去越南搜捕共产党分子，把数十万美国士

^① 见本书第9~10页。

兵送往大洋彼岸。

资本主义世界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它们担心会即将灭亡；与此同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假设下展开的。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念来自马克思，这一公认的事实把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只是到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突然醒悟，一位倡导共产主义的巨人在这个世界上无情地消失了。到了 21 世纪之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灭亡的迹象，这使许多人疑惑的目光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

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最终将会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被取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也不代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全部论断。因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认为资本主义利润率虽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但也仅仅是一个趋势，并不代表一定下降。即使下降，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利润率回复的可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远，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倒是让许多人感觉到一个新社会即将来临，这似乎是 20 世纪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的最好的学生。他毕生 65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就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把资本主义视为当时最富有生命力的、比封建主义更为优越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它是不会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的。按照这种逻辑，他期望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发生在英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在当时，俄国共产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俄国共产党的理论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俄国共产党的胜利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于是，人们认为俄国真正发生了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

不过，在当时对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还在建设资本主义，这与马克思

的观点不谋而合。列宁实际上也强调加速建设苏联资本主义，只不过冠以“国家”的定语。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加上苏联逐渐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苏联化和把马克思神化的风气的影 响，人们无暇分辨苏联究竟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比较。这样，就给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即将灭亡的时间表。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巩固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信念，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自己前途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击退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并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既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也提升了人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施加了强大的压力。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的滞胀现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感觉。于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经济调整，以对付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即使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真正建立起能够长命百岁的自信，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确切地说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而在经过整个 20 世纪之后，人们似乎可以用后见之明这样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全部的潜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还不能立即灭亡。

二、诠释了 20 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沉浮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也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在世纪之末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惊人局面。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可以认为，20 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进行着，而且还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打出了一个第三世界，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社会主义对于 20 世纪的影响，是以苏联为龙头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概念。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展得很快，但终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的是议会道路。后来证实，这条道路是不能通向政权的，因为它的政治势力的扩大依赖于经济繁荣，而在经济繁荣时，恰好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正确。不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过魏玛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巩固住自己的政权，而且实质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以后也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

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对整个世纪都产生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共产党，出现在俄国。它不仅取得了政权、保住了政权，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能够成为反抗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和主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声望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空间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阵线推到了德国的本土，推到了柏林，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卫星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使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它的反殖民地的口号和行动为它带来了第三世界普遍的信任，当然这些信任主要来自那些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独立出来的殖民地。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不光彩表现，似乎使人们认定，资本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那些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希望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就是结束冷战、实现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的声望在1956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苏联本土，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苏联本身。苏联国内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所想象的结局大相径庭。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声望再次受到损害，但这次似乎注定是致命的损害。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公开化政策，在他的参与下于1989年推倒了柏林墙，随后他自己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权力。苏联不是因为政治解体的，首先是因为它在发展经济时出了问题，它没有及时解决产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欧剧变实质上也是以市场经济改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而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带向成功。它宣扬的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它拒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正是由于他和他的时代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的区别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人们才会如此惊呼社会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胜利。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苏联执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宣布效忠于马克思、效忠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被广泛印发、宣传，马克思的论断被作为真理广泛应用。仿佛一切都已由马克思注定、由马克思预言。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人们疑惑的目光

才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事实上，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出了资本主义要灭亡的结论。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不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应该不应该局限于苏联形式的公有制，都是他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列宁认为，在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后来，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甚至被认为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于是，人们开始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因为列宁论述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单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毋庸置疑，俄国进行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它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或者说是土地问题。士兵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包括先进的、集中的工人阶级。但是，夺取政权与维持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可以依靠当时的工人阶级，而维持政权就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所以，这里并不涉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非常幼稚，甚至还没有资格被革命。这一点在苏联新经济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确，列宁当时要发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以便能够赶上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列宁进行的革命，与马克思所言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两回事。所以列宁置换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也可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改写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

三、演奏着20世纪日益高昂的自由主义旋律

20世纪自由主义的旋律，始于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中叶，他就目睹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盛况，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繁荣，体会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从而在那时就已经奏响了自由主义的序曲。商品、原料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之共同运动的还有劳工和资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开辟欧洲本土的殖民地，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自然立即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因为几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试图在欧洲本土扩张领地。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重新提高了关税，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

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许多国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本土，但是这毕竟与

先前的世界市场不同，以往在世界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秩序被打破，与这种国际分工相连的专业技术和工艺也因为缺乏市场的支持而衰退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卷了进去。到了1929年，美国也由于股市崩溃而进入了衰退的行列。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寻找办法，首先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然而，这时的经济学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家像以往一样，仍然信奉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经济会自动修复自己。但是，经济自动修复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有些国家甚至看不到经济自动修复的迹象。人们迫切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这时，有一位巨匠拿出了干预的秘方，即凯恩斯提出了赤字政策。他认为，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可以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产品，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可以补偿早些时候的政府赤字，实现财政预算的跨年度平衡，使经济进行良性循环。虽然这违反了传统的年度内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已经别无选择。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理论能够改变经济格局，走出经济谷底。

实践证明，凯恩斯的理论是成功的。它成为英国和美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成功对付经济衰退的主要武器。政府为了消灭经济衰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大量钞票源源不断地印出。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在当时，通货膨胀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人们相信，一旦投入的资金能够取得回报，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增加投入、增加钞票也不是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对于通货膨胀视而不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非但经济没有复苏，反而通货膨胀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货币贬值使许多中产阶级也进入了贫困的行列，更有甚者，英国的累进税把原先达不到大公司规模的企业也纳入了更高的税收体系中，因为这些小公司和个人商贩的货币收入达到了大公司的纳税范围。此时许多政府明显意识到，比经济衰退更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过大打乱了经济自身的活动规律，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把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当初人们为了增加就业、复苏经济，宁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如今人们宁愿付出失业的代价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导致了撒切尔、科尔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事实证明，人们宁愿忍受很高的失业率，只要有个较好的长期结果。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进步，因为财政赤字是由政

府控制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发行标准，是政府意志的自由，但却是经济本身的不自由。货币发行量同样也是由政府控制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参照的发行标准，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样，凯恩斯政策仿佛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驾驶员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图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而货币主义政策则是行驶在大海中的航船，船长虽然有自己的目的地，但它必须适应大海的风向和浪潮，确保不被大海吞没。在凯恩斯政策那里，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开支创造就业；而在货币主义政策那里，政府只能通过创造良好条件发展企业，而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显然，这是对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归，因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合理干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四、打开了 21 世纪方兴未艾的全球主义大门

21 世纪的全球主义源于 19 世纪的全球主义。19 世纪早期的航海探险，引发了后来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活动和殖民活动，并逐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全球主义。所不同的是，19 世纪的全球主义，是以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对外扩张为特征的，还保留着许多殖民色彩，武力往往起辅助作用，只是偶尔也起着开道和保护作用。此时的全球主义实质上是一部分国家对于另一部分国家的市场扩张，英国是其中的领导国家。

20 世纪的全球主义是以政治对外扩张为特征的，它甚至还消灭殖民地、帮助建立新的国家。它在经济上表现为更多国家的对外扩张，但实际上 19 世纪形成的资本、劳力的自由流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实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本管制。21 世纪的全球主义，劳工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公民权与该国的福利制度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 20 世纪阶级斗争的产物。

与此同时，与 20 世纪不同的，在 21 世纪是经济主宰政治，而在 20 世纪是政治主宰经济。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在 WTO 这一经济组织中常常败诉并深感对此无能为力，这是 20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未体验过的感觉，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支配或者无视联合国，但不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 WTO。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但它要在 WTO 成员国中发挥作用，也只能按照一国一票的方式行使权力，而不能像在世界银行中所表现的那样，以自己的经济实力谋取单独的实惠，这显然也得

感谢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选举权的倡议和肯定。在 WTO 中，一个甚至相当弱小的成员，都可以拥有与经济大国同样的选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近年来几次大的诉讼案中败诉的重要原因。人文主义给原先的以财产为基础的自由政治经济秩序加上了道德约束，使得自由市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得不兼顾公平。

19 世纪尤其是后期已经形成的全球主义，往往是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全球化，到了 20 世纪之初，已经出现以殖民主义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帝国主义现象，许多国家成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的政治手段剥夺着殖民地的财富。先是印度，后来是墨西哥被纳入到了这样的体系中，本国的发展为其他国家所安排。印度在独立之后把自己的落后归罪于英国的变向的殖民掠夺，这一看法在拉丁美洲得到了相应的验证。

为了抵制这种不平等现象，许多希望发展的后起国家，开始通过关税保护来发展自己。尽管保护的方式存在着出口替代与进口替代之分，但其实质是要在发展过程中获得相应的机会和利益。20 世纪的大萧条，加深了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壁垒，当英国要求美联储为其及时提供通货支持时，美国认为事不关己而拒绝了，但其后美国也陷入经济萧条之中，这是美国货币当局所始料不及的。不过，正是这种壁垒，才使得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政策有用武之地，因为一旦国际之间存在着货币或者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不是壁垒式的管制，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在发行过多钞票、扩大财政开支时，必然会反映在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会抵消这种努力，它将会通过扰乱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实现这种抵消。

但是，野兔不能一直关在门后。一旦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或者国外存在着更为合适的环境时，野兔便会逃出国门。而一旦冷战结束，战争不再是一个威胁商业的最重要的方面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欲望便被调动起来，于是，争相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就成为了一种时尚流行起来。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网络技术为跨国公司方便地进行全球规模的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过剩和金融创新，也加速了资本全球化进程，从而吹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主义的春风。许多国家为了加入这一进程，不得不积极解除资本管制，加速削减贸易壁垒，以便在对等的条件下取得平等的贸易权。

于是整个世界仿佛又恢复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全球化景象：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中国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我认为《马克思的复仇》对于了解21世纪全球化大趋势，重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也是我翻译此书的初衷。

不过，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作者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起因所持的绝对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影响所持的相当漠视的态度，以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69~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